

春風化雨·桃李滿天下

記王琰芳老師的教學風範

● 莫迺 滇 (中視資訊科技公司前任董事長)

(彩色圖照刊第二頁)

因緣湊巧得沐春風

五十四年前，五十四位來自中國各省各地的稚齡兒童，因緣際會在座落於台北市公園路的女師附小（現改名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六年信班，一起讀書、一起遊戲，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大家相處不到一年後，在一九五三年，有五十三位同學畢業，各奔前程。與她對空口學味在五十三年後，這些當年天真爛漫的兒童，走過不識愁滋味的少年，越過青澀的年代，踏過坎坷的道路，通過重重的難關，已經邁入耳順的年

齡。他們珍惜兒時的同學因緣，決定在今（二〇〇六）年五月六日重聚於台北市的點水樓餐廳，再續前緣。其中，有十多位同學遠渡重洋，來自美國各地。事實上，這些同學並沒有因為歲月的流失而失去聯絡。使他們不斷保持聯絡的軸心是王琰芳老師——她是當年六年信班的導師。這麼多年來，她就像磁石般地，透過通信、聚會、或互訪，把六信的同學一直緊緊地凝聚在一起。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每個同學都曾受教於無數的老師。何以六信班上的同學仍一直記得他們的導師王琰芳老師呢？我想這也恐怕是緣

分再加上王老師的特殊修養與氣質吧。據王老師說，她是在一九四八年開始到女師附小教書的。當時，由於有一位朋友的太太因病請假，請她代課。代課一個月後，而與她素昧平生，擔任五、六年級導師。也因此，王老師在一九五二年做了我們的導師，結下師生之緣。王老師每次談到白校長，都流露出無限感謝之意，充分顯示了中國讀書人飲水思源，不忘本的美德。

出身名校品格卓異

王老師祖籍安徽省廬江縣，生於

一九三〇年，因為祖父考中科舉，做了京官，全家遷居北京。她在北京所上的學校都是名校：孔德幼稚園、小學和初中以及中法大學附中高中。孔德中學是北大校長蔡元培與教授李石曾用庚子賠款於一九一七年在北京興辦的，「孔德」與孔子無關，孔德（August Comte, 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是法國現代實證主義哲學家，被稱為社會學之父。孔德中學成立後，蔡元培任名譽校長，北大教授馬隅卿任校長；一九二〇年，國學大師毛子水出任校長，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與魯迅等名教授都曾在該校任教過。而北大教授的子孫，如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人之子及陳香梅均曾在該校就讀過。孔德中學位於東華門大街路北，為清朝「宗人府」舊址。「宗人府」掌管皇族法律、財政，修撰玉牒，是清朝重要的官署。高中畢業後，王老師考取北京女師大國文系，後又轉讀北京中法大學文學系，畢業後

留校二年擔任助教。中法大學也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吳敬恆等人利用庚子賠款於一九二〇年所創辦的，李任董事長，蔡任校長。同年冬，李、蔡二人赴法，與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Legue）及里昂市長赫禮歐（Herriot）等人協議，合作設立里昂中法大學。孔德中學與北京中法大學均設有公費，可保送學生到里昂中法大學進修。王老師到女師附小固然是偶然，而我到女師附小讀書，也是出於機緣，換言之，即是緣分的安排。一九四九年，我隨家人到台北市，住在南昌街二段六號。一天，我與二哥沿著南昌街一路向北走，過了樟腦局（現已改建為財政部）和麗正門（南門），看到一所位於公園路和愛國西路口的小學，這所小學進口處的行政大樓是品字形西式三層樓建築，其古雅的風格立刻吸引了我們兄弟二人。我們遂即向家人反應，希望能到這所小學就讀。就是這樣，我們成為女師附小的

學生。當初，如果我們看到的不是女師附小，而是附近的東門國小，我們就可能成為東門國小的學生，而以後的境遇也一定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始終認為一個人的一生都是機緣命運的安排。我與王老師有師生之緣，更巧的是，我和王老師的夫婿勾紹文先生也有師生之誼。勾老師出身外交世家，他的父親是領事，叔父曾任亞西司司長。勾老師則是我在建中初三的英文老師。個人認為，就讀於女師附小並且受教於王老師，受惠之處至少有以下幾項：

沒有惡補更無體罰

1. 對「春風化雨」的親身體驗：一個人的品格修養受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最深。德國教育家斐希特（Johann G. Fichte）曾說：「德國的復興，歸功於中小學教育的成功」；而各級學校教育中，尤以國民教育階段最為重要。曾任小學導師以

及北京私立文華女中、勵行中學、恆毅中學和北一女國文教師的王老師說：「我認為小學教育非常重要；俗語說：三歲看大，十歲看老，德智體群美五育都在小學六年中打下基礎。而在五育中，以德育最為重要，所以在小學一定要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老師要以身作則，實施愛的教育，至少不要使學生有仇恨，就不會賣國、毀家、殺人、放火。師長愛護學生，學生自然懂得尊師重道。」王老師所說的並不是陳義甚高的大道理，以本人的親身經驗，王老師確實以身作則，做到身教重於言教。作為王老師的學生，我體會到何謂「春風化雨」。這不僅是我個人的體驗，也是大多數同學的體驗。離開女師附小五十年，大家仍對王老師念念不忘的主因，就是由於王老師實施愛的教育。在美國東北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吳吉告訴我有關王老師的兩

件感人的事情。一件是：有一次她教的自然科課程不及格，王老師為此特地前往她家拜會她的父母。另一件是，有一次學校要學生繳兩百元，而她母親忘了此事。王老師自己已掏腰包，代吳吉繳了。後來，她父親知道此事，非常生氣，補繳了這筆錢。從吳吉所說的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王老師對學生的愛心。在六信班上，永遠考第一名的施家昕回憶說：「王老師待我們如同自己的親生兒女，對學業品德的教導無微不至，並且深知每個同學的特長。去年，我從美國回來，特地到台中去看她，她還記得每個同學的專長，津津樂道，令人非常感動。」天下雜誌早在三年前公布的一項調查指出，家長和教師都認為，國中小學整體的品格教育比十年前更差，而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影響品格的「三害」，分別是政治人物、新聞媒體和電視節目。這項調查也發現

由於教師缺少對學生的關懷與愛心，教師對學生價值觀的影響力逐漸式微，排名在電視和網路之後。這項調查也顯示，幾乎所有教師和家長都認為，品格教育非常重要，但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覺得，台灣社會大眾普遍的品格比十年前差。1. 沒有一「惡補」的經驗：由於女師附小當年採取自由開放的教育方式，而王老師鼓勵學生自動自發，因此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惡補」這個字眼，甚至於未曾承受過「升學的壓力」。我從小喜歡看課外書籍，小學時尤其喜歡看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等偵探小說。記得在初中入學考試的前夕，我還看福爾摩斯小說到半夜，不忍釋手。2. 沒有「體罰」的經驗：女師附小不准體罰。對於這點，王老師稍有不同看法。她認為對於過分頑劣的學生，給予適當的體罰可能對學生是

件好事。但由於女師附小禁止體罰，她對同學施以體罰也僅於罰站而已。當然，王老師反對過嚴的體罰。

她甚至舉例說：老松國小以前重視升學率，對學生動輒施以體罰。

她的兒子就讀老松國小，在六年級時被打得一條條鞭痕。更有不顧人道的老師，罰學生高舉椅子，跪在教室門外，無所不用其極，只求考

上有名的學校。王老師說，她的兒子雖然考上第一志願，美華國中。

當他與其他幾個考上不錯國中的同學見面時，一點也不感謝母校，並且還很恨他們的導師，全說要去報仇。因為沒有愛的教育傷了他們的身心。

桃李成蹊頭角崢嶸

由於我在女師附小四年及建國中學六年，都沒有惡補和體罰的經驗，

因此不知道惡補和體罰對升學到底有多大功效。但是，我的女師附小六信

班五十四位畢業同學既未接受過惡補，也未受過體罰，卻有三十九人考取建中、師大附中、北一女、北二女（中山女中的前身）和成功中學。吳吉

說：在女師附小畢業後，王老師曾到她家會晤她的父母，希望吳吉選擇北一女為入學第一志願。當時，她父親鑒於吳吉年紀小，而住家又離北二女較近，故並未接受王老師的建議。王

老師當即同意吳吉父親的決定。吳吉說，事後她才知道，學校以學生考入北一女和建中的多寡作為對導師評鑑的依據。王老師本人其實承受「升學的壓力」，只是她未將這份壓力加諸在學生的身上。王老師從一九四八年在女師附小開始教書，直到一九八五

年在北一女屆齡退休，在教育界服務了三十七年。如今雖已高齡八十六，對台灣的教育仍然非常關心。談到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教改，她表達了強烈的不滿：「現在國小教育似乎使得師長更沒有尊嚴，更沒有地位。教改

本末應該減輕學生的負擔，但卻因沒有固定課本，用書沒有限制，參考書反而增加數倍。」王老師更激動地說：

「現在，大學增加到一百多所，但因師資不夠，設備不足，好學校還是原來那少數幾個。為了能擠進好學校的窄門，補習班增加了好幾倍。而在偏僻鄉村，師資不夠，學生無法課外補習，升學率幾乎是零！」筆者畢生

雖從事新聞工作，但曾在大學兼課多年，對於王老師的看法，深有同感，也認為政府應盡全力來縮短國小中國教育的城鄉落差。自從九年國教實施後，小學教育已不受重視。由於初中聯考廢除，國小就變成一個多餘而無所適從的單位與成長階段。因此，一方面才藝班和英文班吸引了更多家長

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小學教育階段的成長教育目標卻變成了一片空白。相互對照之下，我反而覺得當年未接受九年國教，是福是禍，難以遽下斷語。就我個人記憶所及，在一九五三

年六信班的五十三位畢業學生中，有四十四人考上大學，五人考上專科，一人進入軍校，另外還有三人因早已失去聯絡，不知其讀書進修情形。六信班同學升入大專院校的比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五十四位同學中有二位同學不幸英年早逝，殊為可惜。一位是劉大中，是班上男生中長得最俊的小帥哥，在小學時即已鋒芒畢露，曾當選女師附小的「小市長」（按：當時，女師附小採取民主制度，由學生選舉市長，代表學生向學校提出興革意見），在師大附中時，曾擔任樂隊指揮，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病去世。另外一位是尹建中。尹建中獲得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台大人類學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主任，為我國人類學權威，不幸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因猝發性心臟病去世，得年五十八，台大人類學系為紀念他，設有尹建中獎學金。我與他從小學，中學到夏大都是同學，而劉大中是我小學最要好的同學之一，因此，對他們二人的英年早逝，感慨最深。目前，保持聯繫的同學中，有很多在事業上，極有成就。例如前面曾提到的施家昕和吳吉。施家昕獲得電子物理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電機電子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多次接受台灣與大陸電力公司的邀請，對核電工程提供意見。吳吉獲得美國東北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於一九七三年進入波士頓愛迪生公司的核能發電廠擔任核能工程師，為該發電廠傑出女性工程師，多次接受當地報紙的專訪。另外，獲得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方光珞，是莎士比亞專家，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舊金山州立大學和台大及台灣其它大學（政大、東吳、文大和淡大）都是知名的英文教授。目前，她正利用三週的假期，在天津南開大學授課。具有高度文學素養的方光珞在談到對王老師的印象時說，她對王老師一口的清脆而標準的京片子，透過眼鏡而顯露出的銳利眼神，挺直的脊背所展現的尊嚴，以及驚人的記憶力，印象最為深刻，而每次收到王老師的來信，都會把她帶回到兒時黃金歲月的美麗回憶中。目前，方光珞正和獲得康乃爾大學生化學博士學位的鄭至麗合作，翻譯一些文學作品。一九七二年，我獲得美國傑佛遜獎學金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研習大眾傳播學時，鄭至麗也在夏大進修，我們算是二度同學。在小學及高中與我二度同學的楊福大，在求學方面，尤值一提：他在台大讀的是藥學系，後來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先取得藥學博士學位，又再獲得牙醫學博士學位，現在安娜堡（Ann Arbor），自己開設牙醫診所。在美國的同學中，還有一人，不能不提：朱鑑川，因為她是促成此次小學同學聚會的靈魂人物。朱鑑川在加州州立大學北嶺（Northridge）分校獲得理學士後，在香港士國際總公司工

